



党的光辉耀边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工作队的工作历史经验

□ 王晓燕

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阐明了“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治疆方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存在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封建地主制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民族隔阂深重,多种矛盾相互交织,情况错综复杂,生产力发展落后,如何疏通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发展,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扎下根;如何帮助各民族人民发展生产,带领少数民族群众共同进步,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在云南民族地区面临的艰巨任务。在党中央领导下,云南坚持“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总方针,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工作,其中,向民族地区派遣民族工作队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云南民族工作队开创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民族工作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筑牢思想根基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

1950年11月,在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的第一次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向边疆民族地区派遣民族工作队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2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以云南民族学院部分学员为主,从省民委、云南民族学院及省级机关中抽调干部,组成了以王连芳任总队长、马耀任副总队长的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队第一队(包含医疗队和地队)。民族工作队的方针是“反对帝国主义,搞好民族团结,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工作”,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做好生产、贸易和文教卫生工作,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搞好民族区域自治。5月中旬,工作队到保山专区傣族、景颇族地区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做好事、交朋友”的群众工作。1952年10月,云南省委组建了省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由曹晋专署专员唐登岷任队长、刘树生任副队长,开赴西双版纳地区开展工作。1953年,省边疆工作委员会组成由袁用之、刘淑湘等率队的省民族工作队第三大队以及临沧、红河、文山等地区民族工作队。云南民族工作队的队员多是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干部和云南民族学院的学员,并且工作队在出发前都进行了集训,所以,工作队队员都能以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1952年至1953年组织起来的民族工作队共3000多人,到边境一线开展以“做好事、交朋友”为基本内容的民族工作,团结民族群众、缓和民族关系、帮助发展生产、提高文卫水平,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由衷赞叹:“盐巴不吃不得,工作队不有不得!”



民族工作队为兄弟民族办卫生员培训班



民族工作队帮助群众把田

不有不得!”

一是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在工作中,面对国民党残军在边境上的不时骚扰、历史上反动统治遗留的民族隔阂、边境地区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加上语言不通、风俗各异、习惯不同,开展工作遇到多方面的困难。但工作队员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为人民服务,把到边疆民族地区工作视为无上光荣的任务,不畏艰难、不计较得失、不怕委屈,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

二是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工作队去往目的地的行进途中,由于车辆较少或道路不通等原因,很多路程都是徒步行进,但没人叫一声苦,掉一滴泪。当时工作队员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们为少数民族群众修路、挖井,却有用不完的力气。工作队队员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切切实实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

三是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为了做好群众工作、锤炼过硬作风,工作队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纪律。有一次,工作队在行进途中到住宿营地做饭时,发现炊具中多了一把锅铲,检查后发现是头天晚上向当地老乡借来忘记归还了,队领导得知后,批评了违反纪律的同志,司务长不顾路途遥远又原路返回归还锅铲。这件事对队员们教育很大,他们在行军中不断增强纪律观念。全体同志下到乡村后,坚决遵守纪律要求,有些当地的傣族和景颇族队员,甚至连自己亲戚请吃饭也都加以谢绝。广大队员在工作中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少数民族群众展示了与旧官僚完全不同的崭新的革命形象,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爱戴和尊重。

打牢群众基础 真诚和少数民族群众交朋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民族隔阂很深。工作队刚进村时,大人小孩都急忙跑回家去避而不见,来不及躲藏的也不敢和队员们搭话;工作队队员用做好事感召群众,一到群众家里,男人跑、女人躲、娃娃哭的场面经常发生。



1950年12月1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次少数民族工作会议纪念。

工作队耐心细致开展工作,真诚地和少数民族群众交朋友,一心一意地沟通民族关系,缓解民族隔阂。

一是尊重少数民族风俗。1951年7月2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联合发布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的“十项规定”,由《云南日报》一版刊出,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广泛反响,1951年9月9日至9月24日,“十项规定”又以公告的形式连续登载了10次。云南民族工作队强调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纪律,各地工作队还根据当地实际作出一些具体规定,决不允许工作队员违反少数民族的习俗、禁忌。工作队用尊重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真情。

二是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听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是和少数民族群众交朋友的一大难关。为了突破这一难关,工作队要求队员每人每天至少要学三句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通过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增进了工作队员与群众的沟通与交流,拉近了工作队员和群众的关系,为“做好事、交朋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和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队员坚持和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村里需要修路,工作队队员主动帮群众修路;看到群众吃水不便,需要挖井,工作队队员就帮群众挖井;工作队队员到群众家里,都抢着帮忙做事;当地群众到田间劳动,工作队队员也主动参加,并传授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群众渐渐地从害怕工作队到信任工作队。工作队队员与群众成了朋友,群众也把工作队队员当作自己寨子的成员,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开了局面。

抓住工作重点 切实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工作队队员深刻认识到,只有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医疗条件、改善生活状况,才能真正带领少数民族群众共同进步,才能真正体现党的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

一是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

云南民族工作队在工作中意识到,少数民族群众最需要工作队做的好事就是帮助发展生产。工作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的同时,还结合各地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把兴修水利、固定耕地、改进耕作技术等作为主要工作任务,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工作队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做好亲自示范又做好典型宣传,在队员和群众共同努力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二是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改善医疗条件。工作队医务人员在给群众治病的同时,通过举办实物图片展览、放映幻灯和让群众用显微镜观察苍蝇、蚊子的病菌等方式,宣传卫生知识;工作队组织群众定期打扫村寨、清理垃圾,填埋污水坑,喷洒杀虫药,消灭蚊蝇鼠等,净化生活环境;工作队大量发放预防药剂,着重消除病源,提高预防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工作队医务人员还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卫生人员。在医务人员辛辛苦苦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一些肆虐边疆几百年的烈性传染病就被消除或有效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三是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改善生活。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简陋的生活条件,使工作队意识到,要大力帮助群众搞好生活。工作队队员手把手教少数民族群众用牙刷、挂蚊帐、做豆腐、做面食、砌灶、盖棉被、做咸菜等生活技巧;教少数民族群众使用生产工具,培养青年匠人,通过多种方式改善和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

保障持续发展 热诚为少数民族培养干部

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帮助民族发展的纽带和桥梁,他们和少数民族群众有着天然联系,所以,培养民族干部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保障工作的持续发展,是当时一项紧迫的工作任务。

一是认真挖掘积极分子。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出来

当干部普遍有“七怕”。工作队遵循党的民族工作方针,耐心细心做动员,认真挖掘和培养前途的积极分子。经过民族工作的锻炼,大部分积极分子在后来的各项工作中经受了考验,发挥了积极作用,成长为党的民族干部。

二是手把手地培养干部。培养民族干部是党在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民族工作队的重点任务。民族工作队用传帮带的方式大力培养民族干部,采取“一帮一”和“带徒弟”等方法,把培养民族干部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位工作队员头上,通过“民族干部当主师,汉族干部当参谋”的形式,锻炼提高民族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少数民族地区很快成长起来一批民族干部。

三是推荐提拔民族干部。民族工作队在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大批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管理本民族的事务,少数民族才能真正当家作主,才能真正体现民族平等。工作队一开始就提出,外来干部要把当地干部从自己的下级培养成自己的上级。因此,工作队外来干部不与本地民族干部“比资格”“比能力”,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有培养前途的少数民族青年,工作队积极推荐他们进学校学习或赴地方工作。民族工作队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很多都成长起来,保障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

云南民族工作队作为新中国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一支特殊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代民族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红军军号的故事

□ 刘锦/口述 关祥祖/记录整理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收藏的红军军号

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渡,是中央红军长征抢渡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位于禄劝县的云南新兴职业学院红军长征纪念馆,收藏着一支珍贵的特殊军号,见证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光辉历史,记录着一个英雄的故事。

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经过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四渡赤水甩开追兵,于1935年4月23日再次进入云南,4月2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寻甸鲁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至四川新建的苏区根据地。中革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的“万万火急”电令,于4月29日发出。5月1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到禄劝翠华界碑村,毛泽东住汪家大院,周恩来住白家大院,朱德住小仓街李家大院。5月2日晨,军委纵队到达团街村、田坝村一带。当晚,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夺取皎平渡。5月3日,军委纵队到达坎坝,5月4日到达团街村一带,5月5日到达皎平渡,队伍随到随渡,当天傍晚军委纵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1日,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进至河渡,准备迟滞追敌。5月2日,红五军团进至小仓。5月3日,红五军团到达团街时,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赶到禄劝县石板河一带就地修筑工事,准备阻击尾追的敌人,以保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随后,红五军团与尾追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在石板河展开了激烈战斗。

战斗期间,一位腿部受伤的红军战士在五六位战友的护送下,找到当地民间中医刘应家里,希望得到帮助救治。红军说:“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这位同志受伤了,你们能帮助我们一下吗?”刘应夫妻俩将红军请进家里坐下,正在红军的裤腿拉起来,看到伤口正在流血,裤腿还沾着高梁,刘王氏将火塘里烧的土豆拿给红军吃。红军说:“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在谈话中,红军伤员取得了刘应夫妻的信任,刘应夫妻用中草药制的药酒给红军伤员清洗伤口,煮草药汤给红军伤员喝。经过精心的治疗,第二天一早,红军伤员就退烧了,伤口的流血也止住了。

这几天,村外小庙堰口等地的阻击战斗仍然激烈进行着,红军伤员不愿多停留,临走时,刘应夫妻还将清洗伤口的药酒送给了他。红军伤员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将身上的军号、手电筒赠送给刘应夫妻。红军战士说:“我们为穷人打江山,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大家都会过上有的饭吃、有衣穿、有地种,不再受欺负的好日子。当革命胜利了,那时是我们穷人的天下,我会来报答你们,你们就以军号、手电筒作为证明,将来或许还能再见面!”

红军走后,刘应夫妻将红军赠送的信件当宝贝藏了起来,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查。之后,他们天天盼、月月盼,盼着红军回来。一直盼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推翻了三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后来,刘王氏将红军军号和手电筒传给了儿媳余学芝,余学芝又传给外孙女刘锦。2021年8月,刘锦将外婆生前传给她的红军军号和手电筒,捐赠给了云南新兴职业学院红军长征纪念馆永久收藏,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军民鱼水情深的宝贵见证物。

(作者单位: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石林的《去思碑》与《遗臭碑》

□ 苏健康/文 方跃章/图



石林武庙



路南州正堂陈公去思碑



路南会官许良安遗臭碑

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鹿阜镇南门外街东,有一处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供奉关羽的武庙。从旧时路南古城的布局来看,武庙基本与城北隅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的文庙南北相对,武庙规模虽然不及文庙,但也分为大门、前殿、后殿三部分。1933年,武庙改为民众教育馆,附设图书室、陈列室、幼儿园。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路南县文化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当地民众和赶街群众读书看报、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1986年,武庙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大规模修缮,成为了解石林历史文化的一处重要场所。其中,保存在大殿后面的《调授石青并提举司提举路南州正堂陈公去思碑》和《路南会官许良安遗臭碑》,记载了两个特殊的历史人物,拓展了这片文物场所的功用。

石林县是一个古老的县治之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牂牁郡时,即在今石林县设谈稿县。唐宋之际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世代生活此地的落蒙部,发展成为三十七部中的强大力量。元世祖蒙哥宪宗六年(1256年)设落蒙万户府,管辖今曲靖以南的13个县(市、区)。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将落蒙万户府削弱为州,命名为路南州,辖区只剩县和县和弥渡县。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川人陈先溶到路南州任知州(明、清时府县等地方正印官称为正堂)。陈先溶在州府门前立下收费公示碑,整治收费乱象。光绪十四年(1888年),主持修建武庙,以“忠、义”为核心,兴办民众教育所,在西河、东山河等地疏浚、筑坝、修桥、补路,改善水利和交通。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先溶逐步平定了困扰多年的匪患,在战火废墟上重

建文庙、魁阁,地方教育日渐兴旺。陈先溶调离时,路南人感念他的善政,立下《调授石青并提举司提举路南州正堂陈公去思碑》,以表达对这位勤政爱民的离任州官的思念之情。《去思碑》昭示后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人,人民将会永远铭记在心里。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3年路南由州改县。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24年,路南人张炽、杨一波、徐景瑚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先驱。

1927年初,张炽受党派遣,回云南参加中共云南特委工作,负责宣传,主编《日光》周刊。当年春节,张炽和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赵鹤仙到路南开展革命活动,在武庙召开大会宣传党的主张,成立了路南农民协会和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路南分会。路南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

1929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到路南圭山地区考察,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30年,杨一波受党派遣到云南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云大附中搬迁到路南,与路南中学合并办学,闻一多、李公朴、光未然、杨一波、杨春洲等知名学者和共产党员不时来到路南。1939年,建立了路南第一个党支部,王以中任书记,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云大附中迁回昆明,杨一波留任路南中学校长。同年6月,国民党路南县长许良安到任,借故检查征粮征税征兵,大肆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短短半年,巧取豪夺150余万元中饱私囊,引起民愤。11月,许良安借故搜查“赤化分子”,镇压路南中学爱国民主运动,抓捕师生,杨一波组织领导全校师生,联合社会各界发动“倒许运动”,许良安逃离路南,被免职查办。1944年

1月,路南人民公立《路南会官许良安遗臭碑》,声明“古无有贪官立碑者”之有,自路南始。夫流芳遗臭,皆自人为;分道扬镳,亦各有别。其人而为流芳也,则碑从而芳之;其而为遗臭也,则碑从而臭之。其碑同,其所以利民、富民者,则各异。路南县长许良安者,实我邑空前绝后之贪官。去不有迹,何以惩前毖后、永垂教训……”。《遗臭碑》昭示后人:践踏人民利益的人,人民会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6年,中共党组织派曹恒光到路南,发动群众斗争。1948年,他参与组织发动了圭山起义,打响了解放战争云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路南县委在山上冒水洞村成立,毕江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路南人民翻身解放。1949年7月,路南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5月成立路南彝族自治县,1956年12月,成立路南彝族自治县,1998年更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石林县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石林风景区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阿诗玛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

(作者单位:中共石林彝族自治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专题联办: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本版主编: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投稿邮箱:ynrb-llb@yndaily.com ynn001@139.com
 联系电话:0871-64162931 64195021
 阅读理论文章请扫码进入云南理论网